企业税收负担计量和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吴祖光 万迪昉*

摘要: 近年,实施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减税政策实施效果会受到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企业治理以及企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企业税收负担计量以及企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第一,需要结合制度环境、政府与企业行为等因素研究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第二,需要基于契约理论和公共治理视角,研究契约类型、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第三,需要重点研究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影响因素及其机理。

关键词: 税收负担 政治成本 产业政策 政治关联 非上市公司

一、引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7.76%,而同期GDP增长按现价计算仅为12.10%,连续15年税收超常增长使企业税负加重,破坏了企业生态环境,直接制约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胡怡建,2010)。近年,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界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①。2011年10月20日,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联合发布的《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显示,税费负担过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针对小型微利企业税费负担过重问题,2011年11月12日国务院制定了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实行结构性减税,利用税收杠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激励企业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消费,已成为我国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减税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法定税率,但王延明(2003)发现企业实际税负的变化只有法定税率变化的0.502。降低法定税率并未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李增福和徐媛(2010)也发现,我国2008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降低仅为1.88%,相对名义税率变化并不敏感。显然,降低法定税率这种减税政策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可能存在税率之外的制度环境、政府与企业行为、企业特征等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与税权平等思想相悖的现象呢?国外学者从政治成本(political cost)、政治影响(political clout)、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政

* 吴祖光,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710054,电子信箱:zgw@xaut.edu.cn;万迪昉,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710049。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控制权动态配置的投融资双方激励相容机制设计:可转债融资契约视角”(项目编号:709721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金融契约及机制设计的中国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自律监管的研究”(项目编号:71173166)、陕西省软科学项目“陕西省政府资助研发活动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与改进研究”(项目编号:2012KRM10)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2011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我国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一半利润用于上缴各种税费。在经营环境恶劣、高成本、利润微薄,的情况下,税制结构不合理、征收方式难以灵活调整等均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近几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一直位于全球的前三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 以及企业特征等角度对企业有效税率存在的差异做了解释^①,但并未取得一致结论。国内学者从微观视角对企业税收负担的相关学术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对国内外企业税收负担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价,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文章在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实践者认识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提供比较全面的理论指导的同时,也指出了企业税收负担问题的一些未来研究方向。

二、企业税收负担的计量

宏观层面上看,税收负担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利益集团讨论的焦点(Gupta and Newberry, 1997),宏观税负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文献也比较丰富。国家税收收入与 GDP 的比值已经成为标准的国家税收政策的代理变量。在企业层面上,虽然企业税收负担计量是研究企业税收负担的关键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而可靠的计量指标。Adhikari 等(2006) 认为,计量企业税收负担涉及到应当将哪些税种考虑在内以及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利润并不代表公司的实际应纳税所得两个问题。企业层面的税收数据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非政府的学者需要基于财务报告构建代表企业税收负担的变量。而财务报告与税务报告之间存在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②,合并报表主体与纳税主体的差异等因素也会使财务报告与税务报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基于财务报告构建的税收负担计量指标并不能可靠地代表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Plesko, 2003)。

尽管如此,国家的税收活动主要基于财务会计报告,国家通过调整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进行征税,因而税收活动与财务报告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许多学者尝试基于财务报告建立科学的计量企业有效税率的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包括两类: 边际有效税率(MTR) 和平均有效税率(ATR)。边际有效税率为企业纳税变化与收入变化的比值,而平均有效税率为税收变量与收入变量的比值(Plesko, 2003)。边际有效税率往往用于企业决策^③,平均有效税率往往作为税收负担的代理变量。吴联生(2009) 认为通常有四种方法来计量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它们是: (1) 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 息税前利润(Porcano, 1986); (2) 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息税前利润(Porcano, 1986); (3) 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 (税前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法定税率) (Stickney and McGee, 1982); (4) 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税前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法定税率) (Shevlin, 1990)。而 Zimmerman(1983) 认为经营利润容易受到会计方法的影响,应用经营现金流可以消除企业会计方法选择对经营利润带来的影响,因此 Zimmerman 使用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 / 经营现金流这一比率来计量企业税收负担^④。方法(1) 和方法(2) 使用税前会计账面利润,方法(3) 和方法(4) 试图基于财务报表模仿应税收入,因而对分母进行了调整。由于财务报告并没有提供充足的数据来完美地计量应税收入,上述计量企业税收负担方法只是近似估计,因此,需要采用多种有效税率计量方法来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认为,包括 Zimmerman(1983) 在内的五个税收负担计量指标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上述所有指标仅仅是计量了企业所得税负担,由于没有考虑流转税、财产税、行为税和资源税,计量结果与实际税收负担相关性很低,从而产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有偏估计(Plesko, 2003); 第二,所得税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不够简约(parsimony),指标存在缺陷,导致需要具体结合企业所使用所得税会计方法选取指标^⑤; 第三,由于税收负担

^①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公司受到较多关注,因此实际税收负担较高;而政治影响假说认为大公司会利用其影响力,谋取税收上的好处,降低实际税率。本文认为政治成本和政治影响假说均是基于公司规模对企业税收负担的解释。

^②时间性差异是指会计系统确认会计利润和税收计算纳税所得时确认收入和费用的口径相同,但确认时间不同;永久性差异是指会计或者税收系统确认的收入(费用) 在另外一个系统不会被确认。

^③Graham 和 Mills(2008) 认为高边际税率的企业会增加债务,享受债务税盾好处。低边际税率的企业倾向于为员工支付递延的股票薪酬、倾向于租赁资产而不是购买资产。边际税率也会影响企业资本成本,从而影响资本预算决策。

^④虽然这些税收负担计量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仍然广泛使用,如 Richardson 和 Lanis(2007) 使用指标(1) 计量税收负担。Derashid 和 Zhang(2003)、吴联生(2007, 2009) 使用指标(2) 计量税收负担。Adhikari 等(2006)、Derashid 和 Zhang(2003)、吴联生和李辰(2007) 使用指标(3) 计量税收负担。Derashid 和 Zhang(2003)、李增福和徐媛(2010)、吴联生和李辰(2007) 使用指标(4) 计量税收负担。Adhikari 等(2006)、Derashid 和 Zhang(2003) 使用 Zimmerman(1983) 指标计量税收负担。而李增福(2010)、吴文锋等(2009) 对指标(4) 的分母进行调整后的指标代表税收负担。显然,财务报告的结构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企业税收负担的计量方法并没有随财务报告内容变化有实质性的改进。在税收负担计量上,体现了学术的继承,但是表现出创新不足。

^⑤如在应付税款法下,企业利润表中所得税项目等于实际缴纳所得税,不需要做任何调整。而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项目并不等于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需要对递延所得税项目进行调整。因此,基于利润表构建税收负担计量,需要结合具体的所得税会计方法,做出相应调整。

指标构造方法不同,使用不同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会得出企业同一特征对税收负担具有不同影响这样的结论;第四,上述五种税收负担计量方法没有充分利用现金流量表提供的税收信息^①。

现金流量表是基于收付实现制基础编制,它提供了会计期间企业实际支付的各项税费和收到的税费返还信息,是构建计量税收负担指标最可靠的信息。结合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提供的信息,可以构建比较可靠的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主要包括:第一,营业收入税收负担率=(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计量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取得的单位营业收入承担的各种税收费用;第二,总利润税收负担率=(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税前利润,计量企业当期单位利润总额承担的各种税收费用;第三,经营活动现金流税收负担率=(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企业当期经营活动现金流,计量企业各种税收费用占当期经营现金流的比例。这些指标主要利用现金流量表提供的税收支付信息,从而提高了计量指标的可靠性。

三、制度因素与企业税收负担

(一) 税收法律变化

税收法律变化往往为研究名义税率变化和实际税率的关系,进而为探究企业有效税率影响因素提供了自然实验。Richardson 和 Lanis(2007)利用1997年澳大利亚税法改革这一事件,研究发现税法改革改变了有效税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但税法改革后有效税率与规模、杠杆、资本密度和存货密度的关系仍然存在。王延明(2002)研究了我国2001年上市公司停止享有所得税地方返还政策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法定税率变化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只有法定税率变化的0.502,有效税率对法定税率变化并不敏感。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当上市公司面临税率上升时,会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有效税率的变化。但对于名义税率下降的公司,有效税率变化不明显。吴联生和李辰(2007)研究了在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并实施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对不享受中央政府认可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司实施“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导致这些公司与享受中央政府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没有显著差异,结果是损害了中央政府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李增福和徐媛(2010)研究了所得税税率调整对实际所得税负担的影响,发现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趋于一致,且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仅降低1.88%,相对于名义税率变化并不敏感。

Wilkie(1988)将名义税率变化对企业有效税率影响并不敏感归因于税收优惠因素,李增福和徐媛(2010)认为税法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种税收优惠、企业的避税行为等,使名义税率往往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所得税负担程度。我们认为,企业税收负担是名义税率、征管行为、高管决策行为和市场约束机制等因素的函数,因而名义税率对实际税率影响并不敏感。即使名义税率下降,但征管力度加大,使实际税率下降并不明显;会计信息是税收征管的基础,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过程需要在会计系统提供的利润基础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而会计系统提供的利润是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会计方法选择等行为因素的影响。另外,高管的盈余管理等行为也会导致实际税率对名义税率变化不敏感。

(二)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会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有效税率存在很大差异。Omer等(1991)认为,发展中国家税收系统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增加出口、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及保护国内公司。因此,发展中国家某些行业会受到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应当在行业水平上研究有效税率。Kim等(1998)注意到行业是影响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但未做深入解释。不同于政治成本和政治影响假说,Derashid和Zhang(2003)突破了基于公司规模的解释,发展了产业政策假说^②,认为产业政策是影响不同行业的企业有效税率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1990-1999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和旅游行业的有效税率显著较低,并认为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对制造业和旅游行业的政策支持。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不同产业之间的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如王延明(2003)发现我国不同产业间公司实际税率有显著差异,Zimmerman的“规模影响”表现了更多的“行业影响”。Wang等发现我国物流业的税收负担低于社会平均税

^①1987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表《第95号财务会计报告——现金流量表》,要求从1988年7月15日以后的会计年度起,所有企业以现金流量表代替财务状况变动表。显然,包括Zimmerman(1983)在内的税收负担计量指标均产生于1988年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之前,因此,这些指标均未包含现金流量表信息。

^②我们认为政治成本假说和政治影响假说强调企业规模与有效税率的关系,行业因素仅仅是次要的或者调节因素。但产业政策假说重点关注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税收负担的影响。

收负担,但是当考虑利润边际的影响后,物流业的税收负担偏重。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从而改变企业税收负担。

(三) 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Rajan 和 Zingales(2003)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资本主义会经历从最初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经济的转化。企业与政府建立紧密的联系,可能使企业获得包括税收减免在内的好处,也可能强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因此政治关联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Adhikari 等(2006)认为政治关联为企业税收负担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含义,在以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忽略政治关联来研究有效税率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Kim 等(1998)、Derashid 等(2003)的研究虽然注意到长期存在的行业政策因素的影响,但还仅仅局限在工业化范围,而没有在以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情境下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忽视了公共政策中存在的关系(个人)维度。仅仅研究产业政策与税率的关系可能忽略了产业政策本身具有内生性,因而没有抓住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为了考虑公共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对税收负担的影响,Adhikari 等(2006)基于政治关联视角解释企业的有效税率,研究发现在马来西亚,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效税率显著低于没有政治关联公司的有效税率,揭示出在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中,政治关联是影响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我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很多、很强,大量企业的高管具有政府背景(吴文锋等,2009)。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能为企业带来政策性好处。结合我国具体制度环境,吴文锋等(2009)发现高管的政府背景能够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好处,并且发现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的政府背景带来的税收优惠越多。Adhikari 等(2006)、吴文锋等(2009)的研究充分说明在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中,政治关联确实能为企业带来税收好处。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政治关联影响税收负担途径的研究还不深入。

(四) 股权性质

国有企业管理层与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效用函数存在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税收负担。Spooner(1986)认为企业中存在的政府股权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税收负担。Derashid 和 Zhang(2003)认为国有股比例越高,意味着公司的游说能力越强,其实际税收负担也就越低。但在将国有股权比例作为影响公司税收负担的控制变量时,并没有发现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Adhikari 等(2006)以马来西亚 1990-1999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与公司税收负担显著负相关,即国有股权有助于降低公司税收负担,提高公司价值^①。吴联生(2009)认为 Adhikari 等(2006)只是从平均角度估计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不同公司特征(如是否享受税收优惠)是否会影响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研究了国有股权对公司税负的影响以及税收优惠对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公司实际税率也越高;非税收优惠公司的国有股权正向税负效应显著高于税收优惠公司。这一结果说明政府让国有股权比例高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从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而 Miao 等(2009)发现有效税率与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有效税率与国有股权的关系本身具有复杂性,企业有效税率是具体情境变量的函数。政府与企业通过税收征纳关系成为利益相关者,制度环境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国有股权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具有相机性特征。政府干预、法律完善程度和执行过程、企业决策行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约束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政府与企业利益分割关系。国有股权、政府干预以及政治关联等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至今还没有深入研究。政府作为不请自来的第三者,企业决策行为会本能地对税收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变化以及税收制度的执行过程做出反应。因而,产业政策、税收征管强度、政治关联以及国有股比例等相关因素均成为企业决策过程的输入变量,从而在广泛的层面上影响企业税收负担。

四、企业特征因素与税收负担

(一) 公司规模

规模是企业最基本的特征,公司规模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关系备受学者们关注,但是没有取得一致结论。学术界对此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是 Siegfried(1974)的政治影响假说,认为大公司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与政治游说,因而实际税收负担较低。政治影响假说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如 Omer 等(1993)认为发

^①Adhikari 等(2006)的研究是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作为政治关联的一个代理变量,他们认为国有股权比例代表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程度。

展国家的大公司可能利用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影响税收立法,降低自身税收负担。Tran(1998)发现大公司更多受益于税务规划从而降低税收负担。政治影响假说最早受到 Porcano(1986)基于美国企业实证研究的支持。Richardson 和 Lanis(2007)以 1997-2003 年间澳大利亚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Omer 等(1991)采用韩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泰国等新兴国家(地区)企业为样本,发现有效税率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Kim 和 Limpaphayom(1998)以韩国、马来西亚、香港、泰国和台湾地区企业为样本,发现在 1977-1992 年间,大公司的有效税率显著较低。Derashid 和 Zhang(2003)以马来西亚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Miao 等(2009)利用中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显然,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情境下,政治影响假说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第二类观点是 Zimmerman(1983)的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公司受到公众关注度程度高,实际税收负担也越高。政治成本假说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Hanlon 等(2010)也认为如果大公司投入资源进行税务筹划,会因受到媒体负面关注而带来损失,产生政治成本,表现出较高的实际税率。吴联生(2009)发现我国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更高,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我们认为可能是我国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政府让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除此之外,经验研究也发现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不存在显著关系,如 Gupta 和 Newberry(1997)就 1986 年税务改革法案前的 1982-1985 年和税务改革法案后的 1987-1990 年两段时间,基于面板数据,在多变量框架下,通过控制盈利能力消除利润对有效税率的影响,在更长时间维度上研究发现美国公司规模并不显著影响其有效税率,与 Shevlin 和 Porter(1992)的研究结论一致。

显然,企业规模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尚无定论(吴联生 2009)。虽然政治成本假说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兴趣,但是受到实证研究结论的挑战(Omer et al., 1991)。政治成本假说或政治影响假说,并不是严格基于会计程序和税收法规来考察公司特征与税收负担存在的必然关系,其背后的逻辑关系并不稳健。企业税收负担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环境或者企业特征因素的调节,从而表现出复杂性。如 Wang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用潜变量方法研究发现,经营净损失对公司规模和有效税率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有效税率与公司规模的关系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经营净损失的非直接影响。既然经营净损失来源于公司特征,而不是其政治环境,那么用有效税率来代表企业政治成本就是有偏的。

(二) 财务杠杆

由于负债利息可以税前扣除,而股利是从税后利润支付,理论上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有效税率越低。Stickney 和 McGee(1982)实证检验支持该结论。但 Richardson 和 Lanis(2007)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王延明(2003)、Miao 等(2009)发现公司有效税率与财务杠杆显著负相关。但是 Derashid 和 Zhang(2003)未发现财务杠杆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Omer 等(1991)研究也发现有效税率与财务杠杆并不存在显著关系,企业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之间关系表现出多样性。Omer 等(1991)认为样本中的新兴国家企业主要使用短期债务融资,很少使用长期债务融资,从而表现出很低的负债率,这一现象导致了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之间的非显著关系。Gupta 和 Newberry(1997)、Adhikari 等(2006)均发现计算公司实际税率的方法不同,公司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之间表现出不同关系,既可能是显著负相关,也可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目前,对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关系的研究还仅仅是立足于利息可以税前扣除,因而在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负相关这一逻辑之上,没有考虑企业行为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三) 资本密集度和存货密集度

由于税法规定折旧和摊销可以税前扣除,资本密集度(年末固定资产净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越高,有效税率会更低。存货密集度(年末存货除以年末资产总额)与资本密集度存在关联性,存货密集度对企业有效税率也存在影响。Gupta 和 Newberry(1997)、Derashid 和 Zhang(2003)、Richardson 和 Lanis(2007)均发现企业有效税率与资本密集度显著负相关。Adhikari 等(2006)发现无论如何计量有效税率,有效税率与资本密集度均显著负相关。王延明(2003)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有效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密集度负相关。但 Miao 等(2009)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密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学者们对有效税率与存货密度之间的关系认识也不一致。Gupta 和 Newberry(1997)、Richardson 和 Lanis(2007)发现企业有效税率与存货密集度显著正相关,但 Derashid 和 Zhang(2003)、Adhikari 等(2006)均没有发现有效税率与存货密集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四) 成长机会与盈利能力

成长机会与盈利能力会影响有效税率,企业投资模式和获利能力是导致同一行业、不同年度税收负担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Spooner(1986)认为企业税收负担与投资机会(用市值账面比表示)正相关。Omer

等(1991)发现对于采用累进税制的国家来说,企业税收负担与投资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 Adhikari 等(2006)没有发现企业税收负担与投资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对于税收负担与盈利能力的关系,Omer 等(1991)发现盈利能力是决定有效税率的重要因素。Zimmerman(1983)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就会有更多的应税收入。因而企业税收负担与盈利能力正相关(Spooner,1986)。由于净经营损失的公司支付很少的税或者不支付税,因此有效税率应当与盈利能力正相关。Miao 等(2009)发现盈利能力越强,公司有效税率越高,但是 Derashid 和 Zhang(2003)认为有效税率与总资产收益率或市净率的关系与有效税率计算方法有关。Derashid 和 Zhang(2003)发现效率高的公司支付的有效税率低。Adhikari 等(2006)发现无论如何计量有效税率,有效税率与总资产报酬率显著负相关,但王延明(2003)发现我国企业有效税率与资产报酬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大量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就公司特征如何影响税收负担取得一致的结论。有效税率的计算方法、会计方法选择、企业面临的税制结构、企业与税务机关博弈中的行为特征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如纳税意识和征管强度不同)都会影响到税收负担与各种公司特征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具体情境因素如何通过影响会计程序、税收征纳行为等进而对税收负担产生影响,如会计准则有利于大企业通过会计方法选择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现有的研究也没有从契约理论等视角考察税收负担与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如仅仅认为财务杠杆通过利息税前扣除从而降低有效税率,没有研究债务契约产生的约束、激励机制以及信号传递功能对税收负担的影响;现有研究也没有从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博弈关系视角考察企业税收负担问题,如企业负债可能带来的财务困境成本会改变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关系,从而对企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等。

五、企业税收负担研究展望

税收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组织选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股利政策、并购活动、会计选择、薪酬决策和企业面临的压力(Plesko 2003),税收负担反过来又受这些因素影响,因而表现出复杂性。企业税收负担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黑匣子”,什么因素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以及这些因素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具体机理是什么?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提出未来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1. 制度因素与企业税收负担。在我国,企业的税收费用本身是监管和审计的难点,在各种税收法律处于完善过程,法律和规则所产生的效果值得怀疑(Clarke 2003)的情况下,企业税收负担会受到企业与政府关系、法律实施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研究政治关联、法律执行强度以及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通过揭示企业生存环境因素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及其机理,为税收体系改革和监管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2. 政府和企业行为因素与税收负担。现有文献很少研究在税收法律不健全、执法环境不透明及信息的披露、揭示和可证实等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引发的主观代理问题(政府税务部门代理行为和企业代理行为)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税收征收强度等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税收负担也是企业内部各种代理行为的函数。因此,需要研究内外部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如何通过提高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质量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进而为公司监管者以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决策提供参考。

3. 基于契约理论和公共治理视角研究企业税收负担。企业是契约的集合体,各种契约形成的激励和约束通过改变管理层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但少有文献研究。企业的债券契约、股权融资契约等金融契约均会改变高管决策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如高负债比率使债务契约约束变强,降低经理的会计决策选择自由度,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企业与政府通过税收法律法规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征税活动属于一种公共治理活动,需要从公共契约和公共治理视角研究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

4. 需要研究制度环境因素与企业特征因素共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具体机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受到环境因素和企业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可能独立影响企业实际税收负担,也有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特征影响到实际税收负担,或者是环境因素通过改变企业特征与实际税收负担之间关系的强度影响到实际税收负担。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各种具体因素影响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税收负担的途径和强度,进而为提高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具体建议。

5. 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影响因素研究。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面临的监管环境不同,其所有权和控制权通常也没有完全分离,相同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契约类型,对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产生的激励和约束与上市公司也存在很大差异。研究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及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与上市公司进行比较,进而帮助我

们理解信息披露机制、监管环境等因素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有效揭示非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非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能够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参考文献:

1. 胡怡建 2010 《央企高税负根本原因是行业垄断》,参见 <http://finance.sina.com.cn/g>.
2. 李增福、徐媛 2010 《税率调整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经济科学》第3期。
3. 吴联生 2009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经济研究》第10期。
4. 吴联生、李辰 2007 《先征后返、公司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5.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 2009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第3期。
6. 王延明 2003 《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1期。
7. Adhikari A. C., Derashid and H. Zhang. 2006.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5(5): 574-595.
8. Clarke C. 2003. "China's Legal System and the WTO: Prospects for Complianc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2(1): 97-118.
9. Derashid C. and H. Zhang. 2003. "Effective Tax Rates and the 'Industrial Policy'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12(2): 45-62.
10. Graham John R., and Lillian F. Mills. 2008. "Using Tax Return Data to Simulate Corporate Marginal Tax Rat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6(2-3): 366-388.
11. Gupta K., Newberry. 1997.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6(1): 1-39.
12. Hanlon M., E. Maydew, and T. Shevlin. 2010.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Book-Tax Conformity: A Loss of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Forthcoming 49(1): 294-311.
13. Kern B. B., and M. M. Morris. 1992. "Taxes and Firm Size: The Effect of Tax Legislation during the 1980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4: 80-96.
14. Kim K. A. and P. Limpaphayom. 1998. "Taxes and Firm Size in Pacific-Bas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7(1): 47-63.
15. Miao Shujuan et al. 2009. "Empirical Researc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Actual Tax Burd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EP 05-06.
16. Omer T. C., K. H. Molloy, and D. A. Ziebart. 1991. "Measurement of 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s Using Financial Stateme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3(1): 57-72.
17. Omer T. C., K. H. Molloy, and D. A. Ziebart. 199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irm Size-Effective Tax Rate Relation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8(2): 167-182.
18. Plesko G. A. 2003. "An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Corporate Tax Rat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5(2): 201-226.
19. Porcano T. M. 1986. "Corporate Tax Rates: Progressive, Proportional, or Regressiv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7(2): 17-31.
20. Rajan R., and L. Zingales. 2003.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1. Richardson Lanis. 2007.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and Tax Reform: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6(6): 689-704.
22. Shevlin T. 1987. "Taxes and Balance-Sheet Financ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imited Partnerships." *The Accounting Review* 62(3): 480-509.
23. Shevlin T. 1990. "Estimating Corporate Marginal Tax Rates with Asymmetric Tax Treatment of Gains and Loss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1: 51-67.
24. Shevlin T. and S. Porter. 1992. "The Corporate Tax Comeback in 1987: Some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4(1): 58-79.
25. Siegfried J. J. 1974. "Effective Average U. S. Corporation Income Tax Rates." *National Tax Journal*, 27(2): 245-259.
26. Spooner G. M. 1986. "Effective Tax Rates from Financial Statements." *National Tax Journal* 36(September): 293-306.
27. Stickney C., and V. McGee. 1982. "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s: The Effect of Size, Capital Intensity, Leverage and Other Facto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2): 25-152.
28. Tran A. V. 1998. "Causes of the Book-Tax Income Gap." *Australian Tax Forum* 14(3): 253-286.

29. Wilkie P. 1988. "Corporate Average Effective Tax Rates and Inferences about Relative Tax Preference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0(1): 75 – 88.
30. Zimmerman J. L. 1983. "Taxes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 119 – 149.

Th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 Review and Prospect

Wu Zuguang¹ and Wan Difang²

(1: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Xi'an Technology of University;

2: Management School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erative policies to adjust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SM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business innovation.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e tax reduction policy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literature on the measurement of tax burden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ax burden and then point out the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irstly we argue that schola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behavior when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Secondly drawing on contracting theory 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grate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cluding contract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ternal regulatory) on corporate tax burden. Finally schola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ax burden in non-listed companies in future.

Key Words: Tax Burden; Political Cost; Industry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 Non-listed Companies

JEL Classification: H25 H21 H26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 148 页)

45. Rietz T. A. 1988.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A Solu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117 – 131.
46. Robe M. and S. Pallage. 2002. "The States vs. the States: On the Welfare Cost of Business Cycles in the U. S." *Cahier de Recherche Working Paper* 17 – 20.
47. Salyer K. D. 2007.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and Crash States." *Economic Letters* 94(1): 64 – 70.
48. Shefrin H. 2008.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Asset Pricing*. British: Academic Press.
49. Tallarini T. 2000. "Risk Sensitive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5(3): 507 – 532.
50. Wolfers J. 2003. "Is Business Cycles Volatility Costs?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 6(1): 1 – 26.

The Welfare Costs of Economic Fluctu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Ding Zhifan and Sun Genjin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Does it have potential welfare effect to stabilize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relate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economic cycles research as well as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counter-cyclic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Lucas baseline model we divide the researches of the welfare costs of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into the broad sense and the narrow sense two camp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studies which are conducted by amending Lucas baseline model or using alternative consumption data to test Lucas assertion and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studies which consider the reality of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plete capital markets and consumer heterogeneity or introduce some innovative ideas such as endogenous nature of the fluctuations and growth small probability of crash states and the los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develop the Lucas baseline model. After combing the two camp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pproach and measuring methods we find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go further by introducing consumers' labor-leisure choice possibilit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 and the reasonable assumption of the generating process of random consumption stream reasonably.

Key Words: Economic Fluctuations; Welfare Costs; Broad sense; Narrow sense; Lucas thesis

JEL Classification: E3

(责任编辑: 孙永平)